周秀珠: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妇女部部长

□ 王贞虎

周秀珠(1910—1970)出生于香港一个贫苦的海员家庭。她曾任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妇女部部长。

1925年6月,由中共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周秀珠同父亲投身于罢工行列,全家搬到广州。6月23日,她跻身于广州各界10万人反帝大游行。当密集人群途经沙基时,突然从河对岸沙面射来英国殖民军猛烈的枪弹,刹那间上百人死伤,鲜血染红了马路。小秀珠顿时惊呆了,目睹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激发起她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无比仇恨。

她积极参加海员总工会宣传队的活动,经常在街头闹市地段进行宣传,散发传单,演出粤曲、"白榄"小调等,以说唱形式向民众通俗地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宣传大罢工的意义和必胜的决心。1926年3月,周秀珠被推选为省港劳动童子团筹委会委员。不久,周秀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25日,省港劳动童子团成立,她当选为执行委员兼女童部部长。随后,还不到16岁的周秀珠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被调到省港罢工委员会从事女工运动的工作。虚心好学的周秀珠经常聆听邓中夏、苏兆征、李启汉等人的教诲,在高恬波、陈铁军等带领下,进工厂、登轮船、串街巷,向工人及家属进行宣传,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迅速提高。

1927年夏,大革命的逆流骤然冲来。周秀珠再次目睹了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的惨状,短短几天,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让她快速地成长起来。

最年轻的六大代表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无数革命同志的壮烈牺牲,激励周秀珠坚定地投入新的战斗。她先后在广州市委、广东省委从事妇女工作。12月11日,她参加广州起义,冒着枪林弹雨走街串巷,带领青年女工们送给养、抢运伤员。起义失败后,她同省委常委杨殷、罗登贤、陈郁等转移到香港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春,周秀珠被增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并被推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

1928年5月,周秀珠随李立三、杨殷、阮啸仙等,躲过巡捕的跟踪离开香港北上。6月初,他们途经大连转道苏联海参崴,平安抵达莫斯科。出于保密的要求,代表们不能随便上街,一下车便被直接送到郊区的一座别墅里。作为广东省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周秀珠不仅是广东代表团年龄最小的,也是六大84名正式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周秀珠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她是六大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成员,肩负代表们重托与期望,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她除被指定为大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召集人外,还是政治、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及广州暴动问题等委员会委员。从6月18日开幕,到7月11日闭幕,她先后参加了15次主席团会议和22次全体会议,曾同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大姐讨论起草妇女运动报告,研究如何加强全党妇女工作问题,也曾两次主持大会主席团会议,并在大会讨论职工运动报告时发言。会议期间,她每天聆听着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等革命家的讲话,直接领受他们言传身教,学习他们的作风,思想理论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迅速提高。正是这种情况,使年仅18岁的周秀珠当选为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8月17日的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发言,是共产国际会议上最年轻的代表。

19岁当选中央妇女部长

1928年深秋,周秀珠满怀坚定的革命信念,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妇委秘书。由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的张金保因事未到上海任职,中央妇委的日常领导工作重担,就由周秀珠挑了起来。同年1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由项英、周秀珠、邓颖超、彭湃、蔡畅等组成。项英忙于中央工委工作,中央妇委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周秀珠主持。1929年后,19岁的周秀珠正式担任了中央妇委(妇女部)书记(部长),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部门领导人。

处身于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周秀珠投身于地下斗争。她认真贯彻六大路线和方针,研究改进秘密斗争策略,从日常经济斗争入手,采取多种灵活的形式,逐步恢复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她经常机智地甩掉"尾巴",身着女工装束,深入纺织厂做青年女工工作。1929年7月,上海虹口区20余家丝厂女工共1.1万人举行了同盟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待遇等要求。

转战南北出生入死

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周秀珠与战友罗登贤结成革命伴侣。1930年春,罗登贤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周秀珠伴随他返回阔别3年的香港,这儿有他们的亲人和熟悉的街道、工厂、码头。同时调来的还有李富春、蔡畅夫妇。周秀珠与蔡畅并肩战斗,负责妇女工作。同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罗登贤为书记,李富春为组织部长,周秀珠兼做交通和情报工作。尽管他们无所畏惧,勇敢积极,经常深入工厂开展女工运动,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并取得一定进展,但终因执行的是错误的"立三路线",斗争一再受挫,后来省委的交通员被捕叛变,致使几十个同志被捕,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9月下旬,周秀珠同罗登贤秘密回上海,出席六届三中全会。斗争的实践使她清醒了,会上她拥护批判和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坚决支持瞿秋白、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会后罗登贤返回南方,周秀珠留在上海继续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她同杨之华、张金保和邓颖超等,领导了恢复正常的妇女运动的工作。

1931年夏,罗登贤被指派为中央驻东北代表,周秀珠又一次伴他北上,沿途巡视指导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周秀珠亲身经历了东北的沦陷,亲眼见到日军铁蹄践踏下东北父老家破人亡的惨状。她积极组织发动抗日救国运动,参与领导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11月,满洲省委机关遭破坏,省委书记被捕。党中央指定罗登贤兼任满洲省委书记,周秀珠负责省委妇女工作。周秀珠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奔走在白雪皑皑的北国冰城,经常随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等到电车厂、烟厂,向女工们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发展反日会等组织。

但不久,在东北积极地领导和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罗登贤,却被王明路线下的"临时中央"指责犯"右倾错误"而撤职。同年底,周秀珠怀抱仅两个月的婴儿,又伴随罗登贤到达上海。

1933年初,罗登贤留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书记。周秀珠独自带儿子到香港,在罗登贤的姐姐罗才家隐居,哺育营养不良的孩子,恢复虚弱的身体。尽管她的行动十分谨慎,巡捕还是发现了她的行踪并逮捕,殖民当局后因查不到证据,不得不将她予以取保释放。

由于"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上海地下党一再遭到敌人破坏。1934年她又一次被捕入狱。由于叛徒供认,她的身份暴露。周秀珠受到残酷的严刑拷打,被判刑监禁;直到1937年1月获释出狱。

军需生产战线的女厂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秀珠几经辗转找到周恩来,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期间,她主动向党组织汇报了在狱中的表现,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一年后她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机关,当托儿所所长。随后的岁月里,她在延安印刷厂、难民厂等单位当保管员、会计、文书等,1939年被调入延安被服厂。1946年,周秀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经过党组织慎重讨论审查,又经刘少奇等批准,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周秀珠,满怀喜悦,又踏上了战斗的征程。1946年她来到了曾经工作过的东北,被分配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佳木斯被服厂军代表、厂长的工作。在东北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她领导被服厂的工人,克服困难,日夜奋干,保证了东北解放军百万雄师的后勤保障,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伟大的辽沈战役和第四野战军入关的进军中,都凝结着周秀珠和战友们的辛勤劳动,他们用汗水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周秀珠担任中南军区军需部二0一厂党委书记。她接任不久便接受了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生产被服的任务。战争进行了3年,这期间,周秀珠以身作则,经常带领工人们挑灯夜战,生产了一批又一批的军装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抗美援朝的前线。

1956年9月,为表彰她在人民解放事业中做出的功绩,周秀珠荣获了二级解放勋章。随后她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了武汉第一针织厂党委书记、武汉市纺织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武汉市妇联副主任等职务。

1970年12月,周秀珠逝世。1979年4月20日,在为周秀珠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党、政府和人民对她的一生给以了充分的肯定:"她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统战工作

彭雪枫对别廷芳的统战工作

□ 许圣义 许昌浩

1937年,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日军大举进犯中原的紧要关头,党中央将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彭雪枫。1938年2月,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的身份来到了后来被誉为"小延安"的河南确山县竹沟村。

彭雪枫到达竹沟后,立即将驻守竹沟的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前身为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开赴安徽抗日前线。同时争取国民党军政委员会同意,在竹沟设立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

1938年夏,中共河南省委由开封移驻竹沟,并成立了中共河南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彭雪枫担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兼统战委员会主任。

1938年9月底,彭雪枫还在竹沟创办了《拂晓报》,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当时,南阳专区实力派人物当属内乡县的别廷芳。别时任宛属十三县民团司令,不但割据宛西,而且其精锐的武定远、王金铎团就驻守在竹沟外围的泌阳、唐河一带。如何做好以别廷芳为首的南阳地方民团武装势力的统战工作,联合抗日,并争取把南阳地方民团对竹沟的威胁态势转变为援助态势,显得非常必要。

彭雪枫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派统战委员会副主任刘贯一(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委书记)专程赴内乡面见别廷芳,做地方民团势力的统战工作。别廷芳实质上是一个打着自治旗号行宛西割据之实的封建头子。他不容国民党染指他的地盘,更不允许共产党在他的统治下闹革命。但在1938年,别廷芳盘踞的内乡县西峡口镇多次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惨不忍睹,别家经营的商铺门市和工厂在日机轰炸中损失惨重,国仇家恨,别廷芳在爱国抗战思想上有所触动。在此情况下,彭雪枫利用其叔父彭禹廷(已故宛西自治派领袖人物,与别廷芳有交情)的名望,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的身份,书信一封,派刘贯一副主任到内乡面见别廷芳。刘贯一到达内乡后,受到了别廷芳的盛情款待,别不仅认真拜读了彭雪枫的信件,邀请刘贯一副主任参观其老巢——内乡县西峡口镇,而且,对其团队在1938年1月攻打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驻地邓庄铺一事一再道歉。事后,又派人送还了抢走的军服物品。

继刘贯一之后,彭雪枫又先后派中共豫西南地委负责人郭以青、袁宝华等,再赴内乡县民团司令部,对别廷芳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后,别廷芳答应停止反共活动,愿意和共产党合作抗日。

彭雪枫对别廷芳的统战工作,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战场赢得了宝贵时间。

珍赏

套杯彩绘故事《西厢记》

□ 王家年

本文附图为一套10个粉彩马蹄杯,从小到大能套在一起,最大直径23厘米,最小直径3厘米,描绘的是古代仕女下棋、看画、聊天等图案,背景配以树木、花卉和山石,在最小一个瓷杯的内底绘一个仕女人物,每个瓷杯底部都写"大清道光年制"的篆书款,整套保存完整的不多。

所谓套杯,即成套之杯,为套具中的一种,有三套、五套、七套不等。在瓷器中以彩绘套杯受世人青睐。彩瓷套杯层层相套,胎骨细腻,造型规整,釉面纯净,装饰柔丽。清晚期粉彩瓷器民间也大量使用,图案也更加丰富多彩,有花鸟人物、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装饰题材。粉彩色彩柔和典雅,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丰富,生活气息浓厚,构图精美,别具匠心。民国年间粉彩瓷的烧造更广泛,历朝历代的仿制品也随之出现。

套杯,在嘉庆以后比较流行,一直流行到到民国,粉彩以青花为多,画以人物为主,有琴棋书画,民国仿了大量的嘉庆、道光款。道光官窑的产品绝对是精中又精,有官款的一定要仔细记住真的写法,用字体的辨别方法有时候也能看出来,辨别它的新老。

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一套清嘉庆时期的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大小依次套叠十件,每件造型一致,倒视呈马蹄状,敞口削腹,平底内凹,口平如一,缝隙紧密。口沿为金彩,杯内壁与足底施豆瓣绿釉。最大杯底有纪年款:"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分别绘《佛殿奇逢》《妆台窥简》《僧房假寓》《斋坛闹会》《长亭送别》《锦字传情》《夫人停婚》《衣锦还乡》《乘夜逾墙》《白马解围》等场景。色彩柔丽典雅,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丰富,生活气息浓厚,构图精美,别具匠心。如《夫人停婚》,写琴童搀扶心灰意冷的张生离去之状尤为入神,立着的老夫人冷酷无情,躲在一旁的莺莺却伤感失望的情形在这小小的杯身上有所反映。为满足套杯相叠时的整体视角效果,将叠在最上面最小的一件《妆台窥简》的图案绘在内底心:身着红衣绿裙裤的红娘斜身倚立在梳妆台旁,举镜窥简。

《西厢记》来自唐代元稹《莺莺传》的传奇小说,后经金代董解元、元代王实甫、关汉卿、明代李日华、清代查继佑等改编成不同版本。清代瓷器上绘画的《西厢记》图案是根据元代著名戏剧家王实甫改编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插图,《西厢记》戏曲在明清两代瓷器绘画上是广为流传的题材。

嘉庆在位25年,早期官窑烧制的瓷器与乾隆时期作品差别小,后期较为粗糙。嘉庆时以粉彩为主,在器物内壁和底部施豆瓣绿釉为特点,瓷器上描金工艺更为普遍,器形、图案延续乾隆时的传统。

奇珍"辽三彩"

□ 钱国宏

公元916年,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辽,这个由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吸取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系列灿烂文化。这其中就包括"辽瓷"(陶)。辽代烧制的各种陶器,由于受当时的材料、工艺等影响和制约,尚属于一种低温彩色釉陶制品。这些陶制品多用黄、绿、褐三色釉,且继承了唐三彩的传统技法,故史学界、考古界称之为"辽三彩"。

辽三彩最早烧制年代始于何时,目前国内尚无确切证据可考。但从有确切年代的墓葬出土的器物中,发现在辽穆宗应历年(951—969)以前就已有了黄、绿单色釉陶器,可以断定这时已经有三彩陶器。

辽代三彩承袭了唐代传统,是接受唐三彩传统的一种低温瓷式釉陶,胎质粗而较硬,呈灰黄白色或淡红色。